

东方文学研究 集刊(3)

李勇林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

主办



王邦维 主编
王向远 副主编

东方文学学科： 建设与发展



河南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席香妮

责任校对：马峻

装帧设计：任丽凤

ISBN 978-7-5376-2972-4



9 787537 829724 >

定价：20.00元

东方文学学科： 建设与发展

Y U F A Z H A N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主 办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

王邦维 主 编
王向远 副主编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王邦维主编.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5378-2972-4

I. 东… II. 王… III. 文学研究—东方国家—文集
IV. I 230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2328号

东方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王邦维 主编

王向远 副主编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

www.bywy.com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0.875 字数:290千字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

ISBN 978-7-5378-2972-4

定价:20.00元



一、学科建设

- 3 / 东方文学研究会与东方文学学科建设 / 何乃英
16 / 中国的东方文学理应成为强势学科 / 王向远
32 / 中国东方文学学科建构的历史性 / 卢铁澎
45 / 东方比较文学之我见 / 孟昭毅
56 / 关于东方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 陈岗龙
68 / 全国领先 功绩卓著
——追忆50年前北大东语系创建东方文学学科的杰出贡献
..... / 张朝柯
79 / 我国东方文学研究史上的特殊年代
——以1959年版《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东方部分》为中心
..... / 周冰心
88 / 对东方文学学科及教学的几点思考 / 蔡春华
99 / 关于中国现代希伯来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思考 / 钟志清
111 / 关于东方文学史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 魏丽明

二、东方文学学科先贤前辈与东方文学

- 125 / 与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史有关的胡适的几件英文信
..... / 王邦维
135 / 季羨林“四大文化体系”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 张 晖
153 / 季羨林与东方文学
——从我个人的经验体会谈起 / 梁立基
163 / 学习季羨林先生两篇讲话的体会 / 彭端智
168 / 季羨林先生与北京大学的东方文学研究 / 李 谋
186 / 海纳百川 风范长存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陶德臻教授学术小传
..... / 王 燕

目录



194 / 学界泰斗 教师楷模

——北京大学日语系刘振瀛教授学术小传 /翁家慧

三. 东方国别文学在中国

209 / 波斯文学的学科建设 /张鸿年

217 / 中国希伯来文学研究启示录 /梁 工

233 / 日本文学教学与研究在北大 /于荣胜

247 / 阿拉伯文学研究在中国 /仲跻昆

255 / 印度文学研究、翻译与教学在北大 /唐仁虎

四. 作家作品研究

269 / 从史诗资源大国到研究强国

——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之路 /郁龙余 李朗宁

281 /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与越南古典文学

——以唐诗与越南汉诗为例 /于在照

295 / 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 /陈 融


309 / 原典依据的取舍与中岛敦的文学特质

——以《盈虚》与《春秋左氏传》等中国古典作品关系为例

..... /李俄宪

330 / 20世纪东方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黎跃进

342 / 编后语 /王邦维



学科建设

东方文学研究会与 东方文学学科建设

何乃英

研究我国东方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切入。本文拟从东方文学研究会与东方文学学科建设关系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关于东方文学研究会与东方文学学科建设的关系问题，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来论述：准备阶段（1958年—1978年），基本建设阶段（1978年—1998年），新探索新发展阶段（1998年—现在）。

一

从1958年到1978年是我们东方文学研究会酝酿和准备的阶段，也是我国东方文学学科建设酝酿和准备的阶段。

据我所知，我国东方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即把东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来加以建设的历史，始于1958年。在此之前，只有东方国别文学的研究，没有东方文学整体的研究。如作为我国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北京大学东语系，在此之前，也只有东方国别文学的研究，没有东方文学的整体研究；至于其他大学的东方语言系，就连东方国别文学的研究恐怕也是不够系统的，或者是根本没有的，所以就更谈不到东方文学的整体研究了；而在各



个大学的中文系，则普遍没有开设东方文学的课程，没有东方文学的学科。

1958 年是全国各行各业开展“大跃进”运动的一年。在各个高等学校，“大跃进”运动也包括“教育大革命”在内，而“教育大革命”在中文系的内容之一，就是在外国文学教学研究领域改变以西方文学取代外国文学的现状，建立东方文学体系，形成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共同组成外国文学的新体系。这个革命，首先在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和哈尔滨师范学院等几所大学的中文系展开。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由一部分外国文学研究生、进修生和本科毕业生共同组建东方文学研究小组，“突击”编写东方文学教学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当时，我们用了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把教学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都编出来了（当时干什么都讲究“突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编出教学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其质量自然可以想见）。其中教学大纲和讲义由于觉得不够成熟没有正式出版，而参考资料则作为七卷本《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东方部分》的一卷，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9 年正式出版发行。此后，上述几所大学纷纷开设东方文学课程（作为外国文学课程的一部分），并且为了教学需要，由学校印刷本校教师自己动手编写的东方文学教学大纲、讲义和作品选。

当时，我们的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关于东方文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另一个是关于东方文学的资料严重匮乏。所谓“关于东方文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是指我们这些东方文学教师自己并没有学过东方文学，不知道东方文学是什么东西，东方文学包括哪些作家，包括哪些作品。所谓“关于东方文学的资料严重匮乏”，是指当时国内出版的东方文学作品很少，发表的东方文学研究文章很少。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编选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东方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 年）为例。这本书几乎把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资料，包括



一些简单介绍的资料，全都搜罗进去了；但还是残缺不全，不少国家和作家作品只好空缺。例如：从国家来看，全书只有朝鲜、越南、蒙古、印度、阿拉伯、印度尼西亚、日本和土耳其八个国家的文学资料，其他国家的文学没有找到什么资料，只好从略；从作家作品来看，如关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资料只有两篇短文，一篇是《爱伦堡论泰戈尔》，介绍了苏联作家对泰戈尔的认识，另一篇是《泰戈尔和他的〈两亩地〉》。简要地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和创作，分析了他的短诗《两亩地》，关于日本文学的文章几乎都是介绍现代作家作品，尤其是无产阶级作家作品的，没有一篇介绍《万叶集》和《源氏物语》等古典名著的文章。从这些情况就不难想见当时东方文学研究资料匮乏到了什么程度。

因此，为了解决各个大学中文系东方文学教学研究队伍势单力薄的问题，东北和华北几所大学的教师便想到联合起来共同编写东方文学教材的办法。我们先后于1963年和1964年在延边和呼和浩特召开两次讨论会，并且分头写出了东方文学教材的初稿。到1966年，这部教材已经基本定稿，准备联系出版。可惜的是，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是，这部教材就没有能够问世，并且恐怕以后也没有机会再问世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大部分也就成为后来成立的东方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我们当时的合作为下一个阶段成立东方文学研究会打下了基础。

大约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东语系也越来越加强对于东方国别文学的研究，开设出越来越多的东方国别文学课程，如梵语文学、印地语文学、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朝鲜文学、越南文学等等。这时北京大学东语系的主要精力虽然还是放在东方国别文学的研究方面，但也在雄厚的国别文学研究基础上逐渐开始了东方文学的整体研究工作。如当时已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东方文学课程。当然，这个研究工作也同样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不得不中断。



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们的工作不得不中途停顿下来，但是在东方文学学科建设方面，这个阶段仍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即在大学外语系强化东方文学的有关专业，并在中文系开设东方文学的有关课程。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大学已经设立东语系；新中国成立后，这个系的力量不断加强，专业设置不断完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成为中国培养东方语言文学研究人才的主要基地。从1958年起，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和哈尔滨师范学院等十几所大学又率先在中文系开设东方文学课程，作为外国文学课程的一部分，从而打破了以外国文学为名、西方文学为实的不合理局面，力求在讲堂上为东方文学争得应有的一席之地。我们应当看到，在大学设立东方文学有关专业和开设东方文学有关课程，对于推动东方文学研究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屈指算来，从1958年“教育大革命”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在这个阶段所从事的东方文学学科建设工作，只有短短七八年的时间。由于这个工作几乎是“白手起家”搞起来的，缺乏人手，缺乏资料，由于这个阶段时间很短，所以没有来得及产生像样的成果。但尽管如此，这个阶段在我国东方文学学科建设史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为“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东方文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我们称这个阶段为准备阶段。

二

从1978年到1998年是东方文学研究会建立并开展广泛活动的阶段，也是我国东方文学学科建设体系基本确立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波折，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之下，我国的社会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国的文化教育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人员队伍很快地组织起来，我国的



东方文学学科建设也很快地开展起来。

在东方文学教学研究人员队伍的组织方面，这个时期先后成立了日本文学、印度文学、阿拉伯文学和朝鲜文学等国别文学研究会，推动了这些东方国家文学的教学研究活动；我们的东方文学研究会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东方文学研究会最初称为“全国高等学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后来作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所属的学会，定名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本来也可以称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研究会，但据2003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的通知，按照民政部的规定，正式名称应当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东方文学研究会是一个全国性的东方文学研究组织，拥有会员一百余人。这些会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各个大学中文系（文学院）从事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教师，另一部分是各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和研究东方文学机构从事东方国别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1983年8月，东方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同时召开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从此以后，我国的东方文学工作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大家可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彼此交流，取长补短。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这个组织确实对我国的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特别是高等学校的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东方文学研究会先后在1983年至2004年间成功地召开了十一次学术研讨会，并且成功地举办了二届研讨班，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个大学中文系的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东方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在各个大学积极从事东方文学学科的建设工作，一面在本科开设东方文学课程，一面招收东方文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并且陆续出版各种各样的东方文学教材和研究著作，使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在东方文学学科建设方面，这个时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知道，要建立东方文学学科，必须建立东方文学学科体系，而东方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则首先体现在一系列东方文学史著作



和教材中。经过第一个阶段的酝酿和准备，这个时期我国出版了许多部东方文学史著作和教材。举其要者如下（按照出版时间顺序排列）：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陶德臻主编的《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季羨林主编的《简明东方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朱维之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梁潮等编著的《新东方文学史（古代、中古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张朝柯主编的《亚非文学简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陶德臻等主编的《世界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王向远编著的《东方文学史通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高慧勤等主编的《东方现代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郁龙余、孟昭毅主编的《东方文学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和季羨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这些著作和教材是我国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基本建立的标志。通过这些著作和教材，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几点共识：

一是在研究东方文学史时，必须既重视东方社会历史背景的作用，也重视东方文化背景的作用。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我们也有一个过程。起初，我们较多地注意社会历史背景的作用，注意政治、经济与东方文学的联系和对东方文学的影响，而不大注意各种文化因素与东方文学的联系和对东方文学的影响；后来，我们才逐渐取得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二是关于东方文学史分期问题的探索。根据东方文学自古至今的发展历程，一般把它分为四个基本阶段，即古代、中古、近代和现代。有的把中古又分为中古和近古两个阶段，还有的把现代又分为现代和当代两个阶段。此外还有的采用其他的分期方法（如王向远的《东方文学史通论》分为信仰的文学时代、贵族化的文学时代、世俗化的文学时代、近代化的文学时代和世界性的文学时代等五个阶段）。这些分期方法的基本依据似乎可以概括



如下：参照东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特别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阶段，根据东方文学（特别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规律，并且适当考虑与西方文学的对应关系。

三是在每个阶段里再划分若干地区进行综合评述。综观上述几部著作和教材，可以发现一种大致的发展演化趋势：在较早出版的著作和教材里，每个阶段之内往往直接包含几个国家的文学；在后来出版的著作和教材里，每个阶段（古代除外）之内往往先分几个地区，再在每个地区之下包含几个国家的文学，如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北非、南部非洲等，这样做一方面便于容纳更多的国家而不显得琐碎，另一方面也便于归纳出同一地区若干国家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来，如共同性、差异性、互相影响、彼此交流等。这两种方法比较起来，后者显然更全面，更科学，更符合东方文学的实际情况，更能够包容东方文学的内容。

四是不断充实东方文学史的内容，扩大东方文学史的容量。东方文学本身是极其丰富的，但我们对它的认识却是逐步前进的。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我们过去陆续出版的一系列东方文学史著作和教材，表现了我们对于东方文学的认识由少到多、由浅到深、由表到里的演进过程。

这里还有必要对其中两部书特别加以说明：一部是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一部是季羨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

首先谈谈朱维之、雷石榆、梁立基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这部教材之所以值得特别提出来加以说明，一方面是由于它是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东方文学教材，所以它在各个方面都具有开创性质；另一方面是由于它是由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师和其他大学中文系教师合作编写的。上述几部东方文学著作和教材，绝大部分是从事东方国别文学的教学研究人员（即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



研究人员)和其他各个大学中文系从事东方文学教学研究的教师分别编写的(后者主要是东方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而这部教材却是一个例外,它是上述两部分人员合作的产物。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多说两句。这部《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的价值,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说明:从参加编写的人员来看,这部书包括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八位教师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四所大学中文系的十八位教师,体现了两支队伍共同合作的精神。从这部书的体系来看,它首先分为四编,即古代亚非文学、中古亚非文学、近代亚非文学和现代亚非文学;在四编之下又分为二十五章,分别介绍亚非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这个体系的基本格局后来为大多数人所承认,尽管时至今日一直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如后来的著作和教材往往在每个阶段之下先分成几个地区,再分别论述各国文学,等等)。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它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介绍了有关东方文学的知识,并且有点有面,既有对重点内容的深入剖析,又有对一般情况的全面介绍。总之,这部书是东方文学一系列著作和教材的良好开端。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这部教材是两支队伍合作的结果,由于这部教材建立了东方文学的体系,由于这部教材全面展示了东方文学的内容,所以它经过不断修改,一直延续出版,迄今已经出版了三版,印刷一百四十余万册,有效地推动了我国东方文学的教学工作和学科建设工作。

其次谈谈季羨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在以上所有这些著作和教材中,季羨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这部书在季羨林先生的主持下,集中地表现了北大东语系教师的雄厚实力(还包括个别外请的专家),无论是在资料的翔实方面,还是在体系的完整方面,都大大地超过了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第一,这部书更加重视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作用,在每一编的第一章“概述”部分都分为三节,第一节是社会历史概述,第二节是文化概述,第三节是文学概述。第二,这部书在体例上也更加完备,由于采用每个阶段之



下再分若干地区叙述的方法，所以尽管比同类著作增加了许多章节（即许多国家的文学），却毫无杂乱之感；并且还专设一节“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其中除分别叙述各个国家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脉络外，还进行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指出各国文学的异同。第三，这部书在内容上也大大地扩展了，在国家方面，它不限于几个文学大国，还介绍了不少成就未必很高的国家，其中有些是我们过去几乎一无所知的；在作家作品方面，它也不限于几个文学大家，同时也介绍了其他许多作家作品，提出了新评价，令人颇有眼界大开之感。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东方文学史》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东方文学史体系基本确立。虽然它部头很大（约一百二十万字），是专著，不是教材，但它却成为我国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立的牢固基础。

三

1998年前后，教育部对我国大学原有学科设置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在调整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科设置时，将“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两个原有的二级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并将它置于“中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这一举措促使中文系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又发生了新变化，促使我们不能不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个总体思路之下重新探索东方文学学科体系，重新探索东方文学、西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学科体系问题。

当然，对于教育部的举措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校迄今仍然没有多大变化；但也有不少学校认为，这个举措并不是简单的合并，而是与学科内容有密切关系的，是与学科建设有密切关系的，是符合比较文学、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学科发展本身的规律和要求的，因此这个举措促使他们进一步考虑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促使他们进一步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联系起来，促使他们进一步从比较研究的视角，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东